

PASTOR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olicy
and
Practice

当代中国游牧业

政
策
与
实
践

郝时远
奥塞·科拉斯 主编
扎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中国游牧业

政策与实践

郝时远
奥塞·科拉斯
扎洛◎主编

PASTOR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olicy
and
Practi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游牧业：政策与实践/郝时远，(挪)科拉斯，扎洛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97-5063-6

I. ①当… II. ①郝… ②科… ③扎… III. ①畜牧业—研究—中国 IV. ①F3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420 号

当代中国游牧业

——政策与实践

主 编 / 郝时远 奥塞·科拉斯 扎 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周志静

责任校对 / 卫 晓 高忠磊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063-6

定 价 / 128.00 元

印 张 / 26.5

字 数 / 41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郝时远

看完《当代中国游牧业》这部书稿，优先的感受是一种“释然”，中挪两国研究机构合作的“中国的游牧业：政策与实践”这一项目，终于形成了最终成果。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我曾长期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就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先后通过会议、项目、考察等方式进行过多次交流，其中与奥塞·科拉斯（Åshild Kolås）教授交往最多。她作为“中国的游牧业：政策与实践”这一项目的挪方主持人，不仅出色地履行了双方的协议，而且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工作。相比而言，我作为这次合作的中方负责人，由于工作调动而未能直接参与项目组织的牧区调查。不过，作为“坐享其成”的项目参与者，以序言的方式谈些感想，却是责无旁贷的。况且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的“三牧”（牧区、牧业、牧民）问题及其依托的草原生态环境，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当然，优先的“释然”背后，实际上是一份沉重。这部书稿揭示的中国草原游牧业现状，涉及了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几个传统游牧业最发达的地区，或者说是中国草原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其研究者的田野依托虽然有区域性的局限，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中国的草原、中国的游牧业、中国的牧民群体，在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位一体”发展的突出地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向

中，其重要性较之森林更为显著。因为草原一人一牲畜三位一体的共生共荣关系，绝非历史上的“林木中百姓”可以比拟，也不是至今在大兴安岭林区追随近千只驯鹿迁徙的敖鲁古雅猎民群体所能相比的。

中国的草原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0%以上，分布在13个省（区）的268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市）。其中西部6个省区（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草地面积占全国草地面积的70%，是中国天然草场的主体。草原是游牧业的摇篮，生活在中国草原地区从事游牧业的民众，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他们经年继世逐水草而居，牧放着牛马羊驼，他们与草原和牲畜共同经历着多种自然灾害的考验，他们使这一最古老的产业及其游牧文化传承至今，步入了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传统与现代”议题充斥了各个领域，以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进步愿望席卷全球。正所谓“在整个20世纪里，经济、人口、发展、生态开始成为涉及所有国家和各种文明，即关系到整个地球的问题”^①。在这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等研究报告揭示的资源环境问题，使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重视，温室效应、臭氧空洞、气候变暖、物种消失、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形成了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保护观念和行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与技术-经济主义、自由-发展主义的争论中渐成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对着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其中包括草原生态和游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牧区发展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产条件比较脆弱、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百分之九十的草原退化，百分之五十的草原沙化、盐碱化。牧区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边疆稳固。”^②因此，对中国来说，草原生态的恶化，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特别是从事游牧业生产的广大牧民的切身利益问题，也就是相当一部

① [法] 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1997，第61页。

② 回良玉：《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民族工作文献选编》（2003—200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168页。

分少数民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问题。

中国的游牧业经营体制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体制改革而转变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牲畜自养、草场承包，随着游牧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浮动引导着牲畜数量和品种的发展，一度也出现牧民收入高于农民的普遍现象。但是，游牧业粗放的经营方式在以追求牲畜规模为主导的发展推动下，对有限的家庭草场形成了不断增强的压力，草原载畜量问题成为游牧业发展中越来越多提及的话题。相应地，“草场超载”“过度放牧”也成为一般意义上草原退化的人为动因。2011年的宏观统计数据表明：“全国草原适宜载畜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4.3亿羊单位下降到目前的2.4亿羊单位”^①。草原超载从理论上来说毫无异议，但是游牧业只是造成这种草原负荷的动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人为活动加剧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基本事实，包含了多种因素。“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和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②。草原管理的制度性缺失，往往是导致“超限度利用”现象的原因。而“超限度利用”所导致的草原生态变化，不仅仅是牲畜“超载过牧”的问题，还包括了更广泛的“草原索取”方式，诸如民间行为的“搂发菜”“挖虫草”，政府行为的农业开垦、矿业开发，等等。如果再考虑到气候变化等自然环境因素，草原生态发生的变化显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能归结为畜牧业这一单一的因素。

事实上，即便是牲畜“超载过牧”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但是在不同的草原地区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典型纯牧区（24个旗、市），即“占整个内蒙古草地面积71.55%、可利用草地面积89%的典型纯牧区并不过牧，而是缺载61.27%”，森林猎区亦然。而半农半牧区、农区、城镇工矿区则均属于超载过牧地区。^③然而，笼而统

① 《农业部：我国牧区草原超载过牧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q/2011-07/11>。

② 刘钟龄、恩和、达林太等：《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与生态安全带的建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第63页。

③ 达林太、郑易生：《真过牧与假过牧——内蒙古草地过牧问题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5期。

之地做出类似于“内蒙古草地整体过牧”的判断，也势必导致对草原管理、游牧业政策的影响，在“退牧还草”这一总方针指导下，“休牧”、“禁牧”、“草场围封”、“舍饲圈养”、“人口转移”、生态移民等草原治理政策和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牧民定居虽然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镇化相适应，但是传统游牧方式的生态学意义也因此受到忽视。历史发展表明，“通过游牧方式不断调整放牧压力和牧草资源时空分配的做法，恰好适应了由气候因子控制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的内在波动性规律，使大范围的草地得到了合理利用，既保护了草原生态系统，又避免了自然灾害对畜牧业的毁灭性危害”。而定居化的牧民家庭在改善游动生活艰辛的同时，却相应地加剧了草原（自家草场）的畜牧压力。^①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包括了人文精神的发展，人类学对“传统智慧”“本土知识”的关注，本身就是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由于人为活动的加剧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草原生态总体恶化的普遍事实，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脱离因地制宜的科学治理要求。对于地域广袤的草原地区来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牧民面对的草场资源、牲畜类型和发展规模不尽相同，国家的统一政策需要因地制宜地实施，对畜产品收购价格的市场化调控也需要在“以草定畜”的基础上变化，以保障牧民的收入，避免追逐收益的“超载过牧”现象恶性循环，避免急功近利的无度开发现象继续扩散。“退牧还草”并不意味着游牧业的萎缩或停滞，而是要使传统的游牧业成为现代科学管理下的“环保型经济”。^②

毫无疑问，传统游牧业必须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必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城镇化趋势，因为这涉及人本身的发展问题，牧民的居住条件、收入分配、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文化生活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保障，需要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程度，这是“以人为本”发展的题中之意。在这

① 刘钟龄、恩和、达林太等：《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与生态安全带的建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第107页。

② 额尔敦布和等：《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第309页。

方面，定居化最有利于实现这些保障，但是这并不排斥一部分劳动力继续从事游动性的畜牧生产活动。北欧三国追随驯鹿的萨米人，就是基本实现游牧业现代转型的一个例证。当然，对从事驯鹿业的萨米人群体来说，他们只是萨米人中的一小部分，挪威、瑞典、芬兰的驯鹿总计也不过五六十万头（只），虽然这与中国几大牧区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牲畜规模和几千万从事游牧业的人口无法相比，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值得重视。在这方面，2011年中国政府全面部署了牧区发展的基本战略，确立了“2015年基本完成草原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初步实现草畜平衡，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势头得到遏制；2020年，全面实现草畜平衡，草原生态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发展目标^①，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游牧业、保护草原环境、改善牧民生活的政策。这是目前中国解决“三牧”问题和草原保护正在实施的发展指南。

在实践中，中国牧区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完全按照农业地区的社会变迁模式推进，尤其是在80%的牧区属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条件下，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这种实际不仅是“地广人稀”，更重要的是涉及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诸多因素及其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牧区不是不需要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应突出畜产品加工，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等方面，农业性开垦造成的后遗症、矿业性开发造成的生态问题、人为城镇化造成的转产就业困境，都需要在践行《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得到有效的改变。

中国的“三牧”问题，虽然涉及的人口规模不及“三农”范畴，但是解决“三牧”问题远比解决“三农”问题要复杂和困难，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难点中的难点。对此，不论从宏观数据和战略部署上去认识，还是从区域单元和个案实证中去理解，都不足以全面描述正在变迁的草原生态、游牧业和牧民，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广大区域内正在发生的包括自然环

^① 《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q/2011-07/11>。

境变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发展的良性与变化的恶性交替显现的过程。在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典型的牧区，游牧业仍旧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并呈现增长的势头，而草原生态保护的投入和成效也显而易见，集约化的畜产品加工、新形式的牧民互助合作经营体制、家庭牧场及其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的开发，都在呈现新的生机。同时，牲畜品种改良及其防疫，畜牧产品加工和销售，草原自然灾害挑战（诸如鼠害、毒草问题），草原地带的矿产资源违规开发，生态移民村落的发展，偏远牧区的生活条件改善等问题，依然是需要迫切关注的事务，也是需要集多学科知识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中外学者合作完成的《当代中国游牧业》，从多学科提供的观察和分析，对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启发。为此，在这部著作付梓之际，再次向奥塞·科拉斯（Åshild Kolås）教授几年来的辛勤工作致以深切的敬意！对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中外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10月8日于北京

前言

奥塞·科拉斯* 扎洛**

在世界各地，牧民的畜牧生活方式受到大范围定居项目、畜牧业市场化、草原土地私有化和环境压力的挑战。从非洲、中东和亚洲等世界最大的牧区来看，研究人员对牧民中日益上升的贫困问题和失去土地问题，深感焦虑。许多人会问我们是否正在看到“畜牧业的终结”（Humphrey and Sneath, 1999），尽管牧民对波动和过渡习以为常，但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新的转型类别。由于国家和国际开发组织的介入，牧民的畜牧实践和社会组织发生巨大的变迁。定居、畜牧业更多地卷入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对传统牧区的公共土地使用方式构成了挑战（Ensminger and Rutten, 1991）。许多牧区还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沙化和环境退化问题，尽管学者和草原使用者仍然质疑“退化”的实际含义。而政府出台的牧场保护政策也备受争议，有些专家支持确定载畜量的均衡模式，有些专家则提出非均衡模式或者“新生态”视角。

牧场与水对牧民的生计、以畜牧业为生活方式的可行性至为关键。在当代中国，牧民继续与自然条件作斗争，例如，气象灾害、气候恶劣导致的高牲畜死亡率。与此同时，牧民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例如，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变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问题日益突出。

* 奥塞·科拉斯（Åshild Kolås），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研究员。

** 扎洛（bkra-lo/bkra-shes don-grub），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土地复垦项目，以此来增加农业生产。这些项目将人们从东部人口稠密的地区转移至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地区，而这些地区蕴藏着可供开发的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的“下放”运动。这些项目也是为推进少数民族一体化而大加倡导的，帮助“建设社会主义”，加强中国边境的安全（Dreyer, 1975）。尽管人口转移项目很快失去了势头，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退潮而终止，但国营农场、森林和矿产开发项目仍然在牧区运营。在最富饶的一些地区，部分出于优先种植油菜籽的需要，国营农场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继续在扩大它们的版图（Clarke, 1994）。国营农场的羊毛生产也在扩大，截至 1991 年，中国 10% 的羊毛来自国营农场（Longworth and Williamson, 1993）。

在集体主义时代及之后，畜牧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发展更为现代的畜牧业形式，在更好、更有效地使用草原资源的同时，将牧民融入主流社会。在发展和改进畜牧业的主要项目中，“定居和畜牧”项目包括了设施的兴建，比如，兽医站、小学和居民区，以及将这些设施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道路建设。在 1979 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牧区的现代化和发展动力仍然在一些项目中得以延续，例如“四配套”，即鼓励牧民种植草料，修建冬季草料储存棚，搭建家庭牧场围栏，兴建至少在冬季供他们安居的房屋。“西部大开发”的结果是，新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加快了牧区定居点、矿产和工业开发的建设。这些新的道路和城镇建设在便利牧民交易产品的同时，矿区、城镇和连接设施的扩大继续在减少并消耗着草场资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土地管理实践和政策也经历了变化。在集体化之前，牧区推行的是公共的季节性牧场使用的规定。在 1979 年“经济改革”之后，实施了“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向农村家庭分配耕地使用权。这项政策在《草原法》（1985）实施之后推行得更有力，通过在牧民家庭和当地政府之间签订草原合同，规定家庭使用草原的权利。后来实施了“三十年使用权”政策，并与《土地管理法》（1998）一起合并为法律。尽管“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仍然是管理草原土地使用权的总体框架，但畜牧和农耕之间的重要差别得到了承认。因此，修订后的《草原法》（2003）提供了其他有关草原土地使用和管理安排的法律空间。于是一些牧

区进行了创新尝试，以此来改善集体化畜牧和土地使用的矛盾，并使之正式化。

正如政策制定者常常所发现的，畜牧业的管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由于牧民对移动性的内在需求以及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的灵活适应，问题随之出现，这反映了传统土地使用权政策、资源管理、畜牧技巧、相关的文化观念和实践、权力观念和社会控制机制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又加剧了问题的复合程度。对牧场资源管理和退化之间关系的辩论凸显了达成科学共识的困难。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畜牧业的研究远比单纯的资源管理问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是因为畜牧业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手段，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为获得对畜牧业的综合理解，我们必须研究一系列极为复杂、相互关联的问题，包括草原政策、法律和法规、知识的形成、立项和执行情况、多种畜牧实践、土地使用模式、管理技巧。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变化中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赋予文化意义的。因此，对中国畜牧业的综合研究需要多个田野点的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将学科、方法、规范和语言研究领域的学者集合起来，从多个田野点得出理论视角并予以讨论，包括牧场生态、畜牧业科学、政治和法律研究、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正是本书试图提供的内容。

本书是“中国的畜牧业：政策与实践”课题的成果，该课题作为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而开展，得到挪威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本课题的目标是研究与中国畜牧业有关的当代政策和实践，聚焦环境退化、资源管理问题，尤其是牧场的使用与牧民的牲畜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框架和资源管理政策、当地的政策执行情况等。本课题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源管理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这些动态关系对脆弱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本书旨在将研究当代中国畜牧业的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成果集合起来，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涵盖了四个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是许多研究中国畜牧业的学者所关注的：草原政策的发展、畜牧文化的变迁、草原退化和生态移民。下面我们将对每个议题逐一进行总结。

草原政策的发展

本书第一章从富礼正^①和贾里德·菲利浦^②执笔的“横向政策分析：提高生活方式可持续性发展的工具”开始。作者表示，这类分析可作为促进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有用工具，并提及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移民”和其他主要发展项目。文章介绍了青海省正在实施的发展和保护项目与政策的总体情况，尤其聚焦当前的发展政策对当地人民的生计，以及对变化的社会生态修复能力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一些潜在影响。作者对创新性的 HPA 作为分析工具的使用，以及它如何可以提高青海省牧区区域性发展和保护的水平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个视角，作者就生态脆弱但拥有着丰富社会生态文化体系的青藏高原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可供未来或持续政策讨论的几个优先领域。

第二章扎洛的“雪灾与救助”提供了青海省南部藏族牧区的案例研究。该地区经常遭受雪灾，不仅严重破坏牧民的家庭经济，而且还带来了其他灾害。作者认为雪灾救助和减贫不应耦合在一起，因为雪灾与其他因素导致的贫困是不同的，因此要求的反应行动也是不同的。基于田野调查，文章考察了牧民和当地政府在灾害期间及之后的救助努力，并提供了相关的分析与评估。尽管当地救助机制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改善，扎洛指出，承认畜牧业灾害与农业灾害导致的不同物质损失、受灾人口与贫困人口之间的不同人力资本，将更有助于机制的改善。雪灾仍然是藏族牧民面临的最为常见和最为严重的经济风险，抵御雪灾的措施应在预防和满足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前者包括保持充足的救灾物资，后者旨在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防止他们落入长期性的贫困。

① 富礼正 (J. Marc Foggin)，青海师范大学地理和生命科学院副教授，“起步高原” (Plateau Perspectives) 组织主任。

② 贾里德·菲利浦 (Jared Phillips)，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rkansas) 博士研究生。

第三章是艾米丽·叶^①和盖尔让^②执笔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中国藏区畜牧业：沟里镇发展的持续性与变迁”。根据作者的表述，文章针对的是新自由资本主义语境下有关畜牧业与放牧的辩论。非洲的畜牧业专家认为，日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语境导致牧民采取加快社会商品化的策略，放牧权利和土地租借因此与土地私有化一起被货币化。学者认为这些新的条件遏制了放牧的移动性，有可能减少牧民的生产力。通过对青海省沟里镇的案例研究，艾米丽·叶和盖尔让为这场辩论提供了他们的视角。他们认为，术语“新自由主义”现在经常被用来指称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管理技巧。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被定义为政治上与观念上的规划，要求呼吁减少国家的作用，将自由市场扩展到更广泛的生活领域。作者发现这个术语有助于标记自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正在深化的市场改革，包括强调商品化、取消国家福利条款，以及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等。

第四章是敖仁其^③撰写的“合作利用放牧场制度的理论思考与案例分析”。在目前关于放牧制度的讨论中，“公地悲剧”论一直占据主流，但是，在推行私有化和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制度后，人们发现出现了“私地悲剧”。总体来说，在官方政策支持下，畜牧文化是牧区社会知识生产的基础，这种文化当前正在因为私有化和家庭作为主要的生产单位而受到侵蚀。他们表示在当前的畜牧业模式中，夏季、秋季和冬季的公共牧场被过度使用，由于还未被分配到各个家庭，由此导致草原退化。这与其说是“公用地的悲剧”，不如说是“观念的悲剧”，因为缺少多样性的管理制度，而多样性的管理制度是对多样性的草原生态的恰当反应。合理的放牧制度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放牧家畜与生态环境具有良性互动作用；二是在一个封闭或开放的系统内产出的价值总是大于投入的价值（依靠政府补贴从外部系统输入物流——购买大量的饲草料、打深水井种植饲料、

① 艾米丽·叶 (Emily Yeh)，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理学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副教授。

② 盖尔让 (Ga er'rang)，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理学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博士研究生。

③ 敖仁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暖棚种草等，不符合经济规律)；三是尊重牧民对生产方式、技术模式的个体判断和选择。

过渡中的畜牧文化

本部分的第五章是迈克尔·祖科斯基^①执笔的“北疆的游牧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及其保护”。他指出，牧民掌握着一整套富有鲜明文化特色和价值技巧与技术，是牧民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依赖草原环境，而且与草原环境有着辩证的关系。千百年来，草原决定着牧民的生活方式，而牧民以灵活、变化的方式通过移动性来适应变化着的降水及其对植被的影响。在中国北部贫瘠的新疆地区，说突厥语和蒙古语的牧民拥有在高山、山坡和平原畜牧的悠久历史，他们将牲畜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从历史上看，高地牧场被雪覆盖，不适宜在冬季使用，北疆的牧民于是使用更温暖的低地牧场。随着夏季冰雪的融化，山里的高地牧场和水资源得到使用。牧民基于移动性、高度迁移和机会主义战略的生活方式，正是对不可预测的自然资源的文化上的适应性使用。不幸的是，作者认为，保护和保持新疆牧民文化遗产的能力正在受到威胁。这个威胁并不是来自畜牧业本身，而是来自非畜牧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他们移动性的限制。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并非有利于牧民，因为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新的价值观日益附着在牧民传统的牧场，畜牧业本身的价值观被大大削弱。中国新的市场经济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这些生产力不仅包括人力，而且还包括有助于人们的这些事物，例如，新的技术及它们在土地上的应用、快速发展的人口、资源使用的密集化、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大规模的城市化，导致牧民进入牧场的价值被贬低，也减少了他们进入牧场的数量，土地景观也随之改变。祖科斯基认为，被保护土地数量的增加正是畜牧文化遗产的最大威胁之一。

^① 迈克尔·祖科斯基 (Michael · L. Zukosky)，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地理与人类学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授。

第六章是穆赤·云登嘉措^①撰写的“藏区传统游牧业：现状忧思与前景展望”。作者认为，几百年来，青海省南部地区一直是多民族牧区，在那里生活的藏族没有任何永久定居的概念。今天，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流由于工业和现代化而被加深，造成两种文明融合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作者于是问道：“我们如何在两种形式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之间达到和平共处呢？”由于生态和环境的因素，之前探讨的农业耕种替代畜牧业以及农耕实践嵌入畜牧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文章探讨了联合经营作为替代传统和现代畜牧业管理方式的可行性，这种经营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取自传统畜牧文化。

白玛措^②继续探讨畜牧文化的主题，她撰写的第七章“人类学视野下的西藏牧区亲系组织及互惠关系”提供了来自西藏自治区一个畜牧社区的案例研究。她提出，经济活动并不仅仅是货币的交换，而是发生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的语境内。由社会关系定义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人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而演变，其生成的关系源自亲属关系和婚姻、仪式和宗教、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原则和共同结构。这里的互惠关系指个体、群体和社区之间的交换关系。交换发生在相同的社会阶层，也发生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尽管现金在某些领域取代了某种共享的互惠关系，但主要的因素仍然是相同的，并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基于她的田野资料，白玛措提出互惠关系包括劳动力共享、决策和食物共享。这些过程并不仅仅是资源的交换，而且还用以加强亲属关系和文化的整体性，对于维持大家庭是重要的。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西藏牧区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土地管理的体制性决策力量从类似部落的形式转换到更为中央化的政治体制，即社会主义政策下的“地区”。不过，白玛措发现，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仍然是相同的。牧民家庭的性质和基于亲属的邻里关系，仍然是构成当代中国牧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和根基。

第八章是次仁央宗^③执笔的“藏北高原妇女社会性别角色与健康意识的

① 穆赤·云登嘉措，西北政法大学政法系教授。

② 白玛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

③ 次仁央宗，西藏大学地理系教授。

研究”。她提供了西藏自治区聂荣县尼玛乡的案例研究。聂荣县是第一个执行“禁牧合同”的牧区，该地区近 80% 的牧民因此定居了下来。通过对尼玛乡的调查，文章分析了男女牧民的定居情况，考察了定居对生产、社会活动和家务领域的劳动力性别方面的影响。作者指出，在研究西藏宗教和文化以更好地理解西藏牧民的同时，应更多关注西藏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因此，文章侧重于定居后西藏女性牧民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这是在当代西藏牧区社会定居问题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可持续性和草原退化

本书的第九章是肯尼思·鲍厄^①的论文“西藏牧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发展及围栏运动”。文章讨论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藏自治区牧区发展政策的执行情况，分析了为什么某种干预——尤其是围栏——会被引入。改革时期市场、技术、退化和土地使用权的话语和现实被置于生态、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并分析了大范围的围栏运动的起因及其潜在后果，基于这些趋势，文章预测了西藏牧区未来的发展轨迹。

第十章是奥塞·科拉斯的论文“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话语和绿色治理”。文章考察了牧民、草原管理者、政府官员和学者口中的“草原退化”话语和表述，提供了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民族志田野工作的调查结果。作者认识到退化话语和相关的“草原恢复”实践是政治竞争的主要场所，她无意达成关于退化的“科学事实”，而是寻求说明草原是如何被冠以“退化”的，是何种机制促成的，“保护草原”政策是如何被执行的。绘制退化及其原因的话语地图并将其语境化，可以突出不同利益、观点和群体之间如何通过对话、妥协和竞争达成的政策执行。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退化程度和起因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对于“断层线”的争夺也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显而易见。文章还揭示了源自主要政策目标内在竞争利益的某些紧张关系，尤其是经济发展和集约化生产是一个方面，环境保护和保持是另一个方面。

^① 肯尼思·鲍厄 (Kenneth Bauer)，美国密苏里植物园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s) 专家。